

“新生代”，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以湖南省青玄村为例

赵 芳

Abstract: This text uses the results of my own research about Qingxuan village's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migrate to big cities and are engaged in the industry. 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 of them, I cannot find any statistic data, such as the fundamental index, occupational career, life idea or social contact etc., to support the concept "Cenozoic era floating population" that put forward by Wang Chunguang and Luo Xia, so I think that this concept is not scientific.

“新生代”这个词，学术上有四种用法。一是将其等同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池福安，1998）或曰第五代、“新人类”（沈杰，2001）；二是将其等同于青年人（吕杰，1995），三是指特定人群，如出生于一个特定年限的作家群（金汕、孟固，1997）。四是指称上个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流动人口（王春光，2000、2001）。罗霞、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罗霞，王春光，2003）。我通过对青玄村的调查访谈，感到“新生代”这个流动人口概念界定并不确切，现在我根据自己对青玄村流动人口的调查和访谈来阐述我的观点。

青玄村位于湘西北，有村民1500余人，劳动力800余人。目前正在外务工的人员400余人。我对这个村的田野工作已持续了很多年，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专门对其劳动力外流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63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和有关联性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8份。这58份问卷中，于90年代外出的共计44份，44份问卷中，男性25人，女性19人；25岁以下的11人，其中男性4人，女性7人。另外我进行了40人次的深度访谈，并能够以朋友、邻居或原居民身份参与访谈对象的生命历程，这对于了解该村外出务工人员意识观念的指标，弥补问卷的不足是非常有效的。

一、基本指标

青玄村人从1989年就开始外出务工，但人数很少。由于外出人员基本上都是务工，鲜有经商者，所以本文以“外出务工人员”代替“务工经商人员”这个称谓。根据夹山镇政府对青玄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统计台帐，其年龄分布从16岁至55岁，基本上都是90年代外出的。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最小值20岁，最大值50岁；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24.2岁，最小值15岁，最大值42岁；平均在外务工年数7.61年，务工时间最长的13年，可以说外出务工已经成为整个劳动力所有年龄段的流动方式。

青玄村9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中86.4%的人已经结婚，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6.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2.7%，小学文化的占15.9%，中专文化的占4.5%。问卷中25岁以下的11人中，有5人已婚，6人未婚。他们中8人为初中文化，2人为高中文化，1人获得中专文凭。考察问卷，发现初中文化程度分布在各个年龄段中，高中文化程度分布在40岁以下年龄段中，中专文化程度分布在30岁以下人群中。

按照夹山镇的统计台帐，高达90.7%的人是纯粹出卖劳动力的劳务人员，担任管理和文职的人数

非常少。从我的问卷来看,他们的劳动待遇并不如人意。每月平均工资 740 元,大部分人只拿 600 元,最少的只拿 300 元。每天工时超过 10 个小时,每周 6.46 天。最长的每天工时 17 个小时,每周 7 天。关于消费、娱乐开支这一栏只有 18 个人填写,每月平均 39.6 块,有 5 个人填写了看病消费,每人每月花费 8 元钱。关于签订劳动合同的统计,只有 31.8% 的人签订了合同,经过访谈我得知,不仅有各种不合理的合同条款,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合同名存实亡,丝毫不妨碍资方侵犯劳务人员权益。

二、职业活动

1. 务工前职

在务工前的职业活动中,初中、高中和中专一毕业就出去务工,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一共有 9 人,所占比例为 17.9%;这 9 人中,有 7 人年龄低于 24 岁。其余人中,76.2% 的人都有务农经历,包括年龄小于 25 岁的 4 人。有 23.8% 的人曾经是乡镇企业或煤矿的兼业工人,还有少量退伍军人和农村技术人员。务工前他们的职业分化度并不高,因为他们都以农业为主业或兼业。惟一能看出的一种趋势就是,年龄越小,缺少务农经验的比例越高。

但我的疑问是以 25 岁划界是否就能保证对具有这种特征的人群作最大程度的包含。即使是务工前的职业,也涉及到很多因素,如家庭条件、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教育期望、经济水平不同地区的研究对象其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构成比例也会有所不同。早三年与迟三年进入务工过程,就使得年龄因素发生变化。婚育观念也会干扰这一项,如果已婚就必须至少有一方在某个特定时期留家里,如孕期、哺乳期、小孩年幼,这就又会增加有务农经验的比例。因此,以 25 岁为界会无从体现科学性。

2. 信息获取

调查对象要获取外出务工信息,依赖最多的是亲戚和朋友,其所占比例均为 34.9%。实际上“朋友”也是建立在地缘联系基础上的概念。其次“没人介绍,自己去的”占据了 25.6%。这方面没有年龄的差别。我在访谈中发现,所谓“没人介绍”,是指没有依赖某种“关系”提供明确具体的就业信息,只是由于相信自己与对方在地缘或血缘纽带基础上建立的关系紧密性,就贸然跑出去求职的一种求职过程中的辅助性依赖的类型。它包括暂时落脚、打听就业信息等不损害对方利益的类型,而这种关系基本上都是属于首属群体内的初级关系。这些也没有年龄的区分。

3. 务工动机

表 1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务工动机考察

分类标签	变量名	个案数(人)	反应比例(%)	样本比例(%)
	赚钱养家	39	56.5	90.7
	改变生活	17	24.6	39.5
	想开眼界	13	18.8	30.2
	纯粹跟风	0	0	0
	合计	69	100.0	160.5

注:2 例缺失;43 例有效

从表 1 看,90.7% 的人/次都选择了赚钱养家这个动机。在 43 个有效个案中,高达 56.5% 的频次选择赚钱养家,而“纯粹跟风”这一项没有人选择。从表 2 看出,外出动机虽然是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但务农不赚钱这个经济原因仍然是促使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动因(推力),这和王春光的结论不一致(王春光,2001)。那么务工动机和年龄有没有相关性?

从表 2 看,年龄只与赚钱养家的动机有负相关性,表明年龄越小越不会倾向于赚钱养家,和其他两项都不相关,不能得出 90 年代外出目前 25 岁的年龄就是区分务工动机的标准的结论。

考虑到问卷中有一部分人至今尚未成家,可能不用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因此,已经建立家庭的人应该更倾向于赚钱养家。于是我作了一个婚姻状况与务工动机的卡方分析。表 3、4、5 是婚姻状况与不同务工动机的卡方检验。由于有的单元格频率少于 5,所以用 Fisher 的确切概率法。只有表 3 的 Fisher

表 2

年龄与务工动机相关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赚钱养家	改变生活	想开眼界	纯粹跟风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0.336(*)	0.166	0.035	.
	显著值(双尾)	.	0.026	0.282	0.820	.
	样本容量	44	44	44	44	44
赚钱养家	相关系数	-0.336(*)	1.000	-0.157	-0.082	.
	显著值(双尾)	0.026	.	0.308	0.596	.
	样本容量	44	44	44	44	44
改变生活	相关系数	0.166	-0.157	1.000	-0.002	.
	显著值(双尾)	0.282	0.308	.	0.988	.
	样本容量	44	44	44	44	44
想开眼界	相关系数	0.035	-0.082	-0.002	1.000	.
	显著值(双尾)	0.820	0.596	0.988	.	.
	样本容量	44	44	44	44	44
纯粹跟风	相关系数
	显著值(双尾)
	样本容量	44	44	44	44	44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表 3

婚姻状况与赚钱养家动机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值	自由度	双侧近似概率	双侧精确概率	单侧精确概率
皮尔森卡方	21.095(b)	1	0.000		
连续性校正的卡方值(a)	15.217	1	0.000		
对数似然比计算的卡方	14.270	1	0.000		
Fisher 的确切概率检验				0.001	0.001
线性相关卡方值	20.616	1	0.000		
有效记录数	44				

a 只在 2×2 表时系统才计算校正卡方值。

b 2 个格子(50.0%)的期望频数小于 5, 最小的期望频数是 0.68。

表 4

婚姻状况与改变生活动机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值	自由度	双侧近似概率	双侧精确概率	单侧精确概率
皮尔森卡方	0.378(b)	1	0.538		
连续性校正的卡方值(a)	0.027	1	0.870		
对数似然比计算的卡方	0.370	1	0.543		
Fisher 的确切概率检验				0.662	0.426
线性相关卡方值	0.370	1	0.543		
有效记录数	44				

a 只在 2×2 表时系统才计算校正卡方值。

b 2 个格子(50.0%)的期望频数小于 5, 最小的期望频数是 2.32。

表 5

婚姻状况与想开眼界动机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值	自由度	双侧近似概率	双侧精确概率	单侧精确概率
皮尔森卡方	1.396(b)	1	0.237		
连续性校正的卡方值(a)	0.490	1	0.484		
对数似然比计算的卡方	1.294	1	0.255		
Fisher 的确切概率检验				0.339	0.235
线性相关卡方值	1.365	1	0.243		
有效记录数	44				

a 只在 2×2 表时系统才计算校正卡方值。

b 2 个格子(50.0%)的期望频数小于 5, 最小的期望频数是 1.77。

两侧确切概率= 0.001, 表明婚姻状况与赚钱养家的动机关系非常紧密。表 4 和表 5 表明婚姻状况与另两种动机不相关。

其实务工动机的变化除了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外, 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整个社区观念环境的影响。而社区观念环境的变化表现为社区“小传统”(折晓叶、陈婴婴, 2000: 18、21; 王铭铭, 1997: 45)与其他异质性文化的较量、冲突、融合、变异等。如果社区保持以“小传统”为主导的一元文化观念, 则外出务工人员社区经济条件基础上将易于保持和“小传统”一致的观念, 其中也包括务工动机。近年来随着社区与外界联系的密切, 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的”、“普适性的”或说是“公共性的”知识开始主导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它包括国家政权、学校教育、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共同影响。青玄村远离本地区中心城市常德, 置身于偏远的农业社区中, 这本应使村民对外部世界各种现代化的变迁及信息非常不敏感, 但由于常德市在邮电通讯和计划生育两方面的成绩全国名列前茅, 使得青玄村的这两个指标也非常突出。拿邮电通讯来说, 自 90 年代中后期起, 村中就能收看到全国 10 多个省地电视台的节目, 村民能常年接触到反映外部世界现代性的大量感性符号, 这有助于排除交通落后状况对农村经济和农民观念意识的阻碍作用。关于计生工作, 现在村里两孩户家庭已经非常少, 村民也有高度意愿支持孩子的高等教育, 这个在后面再分析。虽然村里通向县城、本市和省城的公路至今仍很破烂, 但从表 6 看, 现在家中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 几乎达到了一家一台电话和电视的程度。这些条件对于改变农村社区人的观念是不可估量的。

表 6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人员拥有现代化设备统计(注: 移动电话包括小灵通)

分类标签	变量名	个案数(人)	反应比例(%)	样本比例(%)
	移动电话	22	19.5	59.5
	固定电话	32	28.3	86.5
	家有电视	35	31.0	94.6
	有洗衣机	15	13.3	40.5
	家有冰箱	9	8.0	24.3
	合计	113	100.0	305.4

注: 8 例缺失; 37 例有效

什么条件下务工人员才不会进城务工呢? 从问卷中看, 绝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经济条件的满足。如, “中部搞开发, 投资办厂”(阎和平); “自己有固定职业, 收入能维持家庭生活”(阎红军); “小孩不读书后, 不需要钱”(赵本凡); “年纪大了, 不能干工了”(赵国荣); “有一点积蓄, 并且家中能够拥有一般人家拥有的东西”(赵振军)等等。由于是农业生产效益低下(推力)和城市发展(拉力)把他们推向了城市。那么, 如果这种推拉力消失, 他们会作出什么选择呢? 问卷中另一道开放式问题是, “如果将来您在青玄村务农收入和在城市务工收入一样, 您还会外出务工吗?”从表 7 看, 不愿意或不准备再外出务工的占绝大多数。有 8 个人没填, 相信正处在犹豫观望中。25 岁以下选择仍会去的 3 人, 选择不会出去的 7 人。看不出年龄在这方面的决定性影响。从表 8 看也是如此。当问卷中要求他们选择理由时, “不会再外出务工”的人选择的理由如下:

“不如家里自由”(田华军, 24 岁);

“城里环境太差了”(阎忠, 22 岁);

“在他乡做工觉得很受别人的气, 要看老板脸色做事, 受不了, 还有很多本地人看不起我们打工的”(张桂枝, 24 岁);

“因为在家创造自己的事业是光荣的”(袁云贵, 25 岁);

“不会, 我会自己经营桔子园”(刘克明, 18 岁);

“既能赚到钱, 又可以回家照顾大人及小孩”(9 号某女, 23 岁);

“因为在家不管怎样都比外面好”(10 号某男, 21 岁);

“如果收入是一样多的, 那么在家里是最好不过”(33 号某女, 24 岁);

“因为外面打工太苦了”(杨小平, 24 岁)……

选择“仍会外出”的人的回答是：

“因为青玄毕竟比较闭塞”(阎春芳, 24岁)；

“会去, 不为什么”(贺军, 21岁)；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一样的”(赵文龙, 35岁; 赵国荣, 34岁)；

“因为城市有城市的好处, 生活的节奏感绝对比农村强”(谢泽华, 30岁)；

“因为务农的收入再高也是务农, 并且我也不会”(阎艳, 20岁, 第二代)；

“城里发展前途大”(阎光红, 38岁)……

从表8看, 年龄与之不相关。这表明, 即使假设城乡收入一样, 这些务工人员是否仍要外出也并不取决于年龄, 我想这取决于他们对城市的感情评价并与其对实现自我的人生设计有关。例如21岁的贺军是一个宾馆的领班, 而阎春芳也是长沙省委机关办的一个健身中心的领班, 与每天从事起码10个小时以上劳务的务工人员相比, 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务工者们的选择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居民的集体潜意识。城市中大量的排斥性因素导致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对城市认同的困难。这些排斥因素在宏观上表现为以城市居民利益为本位的城市管理政策；在中观上表现为各种工厂对务工人员劳动保护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的公开侵犯和剥夺, 甚至连基本的人身自由权都可以随意剥夺；在微观上则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员在言行态度、日常接触等方面的歧视。这些都加大了外来务工者的生活成本和心理成本(谯新民, 1999)。没有安全感、不自由、不被人尊重、环境恶劣、感情无处寄托、不敢在城市看病、拖欠工资不敢伸张和追讨、普遍超时工作、执法不公等都是问卷和访谈中所反映的问题。可以说, 城市执法管理人员与代表城市“长远”和“整体”利益的资方, 在为城市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贡献的正义大前提下, 在私人利益交换基础上达成了阉割城市管理法规和出卖务工人员利益的默契。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务工者的年龄、婚否等个人因素并不能对其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 从问卷中看不出未婚青年比已婚者或25岁以下青年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就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多的希望和幻想。

表7 如果家乡和城市收入一样, 是否外出意愿频数统计

变量	频度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仍会外出务工	12	26.7	33.3	33.3
不会外出务工	24	53.3	66.7	100.0
合计	36	80.0	100.0	
缺失值	9	20.0		
总计	45	100.0		

表8 青玄村9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与假设城乡收入无差别时外出意愿相关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051
		显著值(双尾)	.	.767
		数量	44	36
	假若一样	相关系数	-.051	1.000
		显著值(双尾)	.767	.
		数量	36	36

三、生活理想

1. 身份认知

9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中国户籍身份和职业身份二者的分离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认定自己身份是否产生了影响?

从表9看, 确有部分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发生了怀疑。共有23.3%的比例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一般来说, 身份认同可以产生心理认同, 身份认知的困难会导致心理定位的偏差。那么什么因素会导致对自己身份认知的不确定呢? 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职务岗位或年龄?

表10是对身份认知可能具有的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考察年龄、职务岗位、务工年限、受教育程度, 发现均与身份认知不相关。可见身份认知不是表10所列因素单独影响的, 相信是来自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表 9

青玄村外出务工人员角色认知

变量	频度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农村人	27	61.4	64.3	64.3
既不是农村人,又不是城里人	4	9.1	9.5	73.8
既是农村人,又是城里人	7	15.9	16.7	90.5
城里人	1	2.3	2.4	92.9
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3	6.8	7.1	100.0
合计	42	95.5	100.0	
缺失值	2	4.5		
总计	44	100.0		

表 10

年龄、职务岗位、务工年限、受教育程度与身份认知的相关分析

		年龄	务工年限	职务岗位	教育程度	自己身份	
斯皮尔曼 相关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0.417(**)	-0.223	-0.105	0.065
		显著值(双尾)	.	0.005	0.146	0.497	0.684
		数量	44	44	44	44	42
	务工年限	相关系数	0.417(**)	1.000	-0.187	-0.338(*)	0.259
		显著值(双尾)	0.005	.	0.225	0.025	0.098
		数量	44	44	44	44	42
	职务岗位	相关系数	-0.223	-0.187	1.000	0.214	0.120
		显著值(双尾)	0.146	0.225	.	0.162	0.447
		数量	44	44	44	44	42
	教育程度	相关系数	-0.105	-0.338(*)	0.214	1.000	-0.157
		显著值(双尾)	0.497	0.025	0.162	.	0.322
		数量	44	44	44	44	42
	自己身份	相关系数	0.065	0.259	0.120	-0.157	1.000
		显著值(双尾)	0.684	0.098	0.447	0.322	.
		数量	42	42	42	42	42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1 时具有相关意义。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在青玄村的调查显示,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认知与下述因素有关:(1)农村户口,非农业的职业;或者非农村户口,但在进城务工前完全依赖当地农业生产维持生活,现在在外务工,并且其家庭其他成员生活在农村;(2)户籍和职业的分裂达到一定年限,起码使当事人能产生较长时期内继续这种户籍与职业分离模式的预期;(3)以城市务工收入为自己及其所必须扶养和抚养的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且同样维持较长时间。当务工者具备这些因素时,就很容易在国家政策和城市管理体制的干扰和对农村生活的主观感情的影响下,动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份作出不全面的判断。农民工的具体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和流于形式,而掌握“绝对”公共权力的,化身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意识输入者并拥有话语霸权的国家和城市则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对身份分裂的无奈,其实就来自于对绝对不对等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分裂的无奈,来自于对公民权利在社会的合谋下几乎丧失殆尽的无奈。

那么是不是城市务工收入满足自己温饱需求之后的那部分剩余量,那部分能够充当事人生活压力晴雨表和减压阀的剩余货币量的数目决定着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呢?问卷中没有这种反映。

2. 安家意愿

青玄村外出务工人员未来的生活理想怎么样?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是否愿意把家安在城市?如果在家乡务农和在城市务工收入一样,他们还会选择外出吗?年龄是否是一个有效的标准?问卷中有

一道封闭式问题：“如果将来允许您自由安家，您愿意把家安在——”。其中“我打工的城市”一项指除长沙之外的其他务工地。从表 11 看，共有 79.5% 的人准备把家安在家乡，而且绝大部分是要在村里安家。这和王春光的结论截然相反。

表 12 考察务工者心情、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与安家意愿的相关性，表中显示前四种变量与安家意愿均没有相关性。问卷中有 23.1% 的人务工心情完全是否定性的评价，20.5% 的人务工心情兼具亮色和灰色两方面。但心情不影响选择在青玄村安家。

表 11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安家意愿统计

变量	频度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青玄村	27	61.4	69.2	69.2
石门县城	4	9.1	10.3	79.5
长沙	2	4.5	5.1	84.6
我打工的城市	6	13.6	15.4	100.0
合计	39	88.6	100.0	
缺失值	5	11.4		
总计	44	100.0		

考虑到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谋生的艰难，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经济因素、城市对民工子女教育的管理政策、感情因素，以及其他由于生活延续性导致的因素，使得很多人只能在青玄安家。在我发放和回收问卷期间就有两对务工者刚刚建立小家庭，有五位女性务工者怀孕回家待产。绝大部分人都有小孩在村里读书，而且几乎都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面对妇女、小孩、老人的扶养和抚养问题，人们就会作出选择。

表 12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务工心情、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与安家意愿相关检验

		务工心情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安家意愿	
斯皮尔曼 相关	务工心情	相关系数	1.000	-0.149	-0.066	-0.248	0.164
		显著值(双尾)	.	0.364	0.690	0.128	0.340
		数量	39	39	39	39	36
	年龄	相关系数	-0.149	1.000	-0.105	0.431(* *)	-0.225
		显著值(双尾)	0.364	.	0.497	0.003	0.168
		数量	39	44	44	44	39
	教育程度	相关系数	-0.066	-0.105	1.000	-0.050	-0.037
		显著值(双尾)	0.690	0.497	.	0.750	0.825
		数量	39	44	44	44	39
	婚姻状况	相关系数	-0.248	0.431(* *)	-0.050	1.000	-0.194
		显著值(双尾)	0.128	0.003	0.750	.	0.238
		数量	39	44	44	44	39
安家意愿	相关系数	0.164	-0.225	-0.037	-0.194	1.000	
	显著值(双尾)	0.340	0.168	0.825	0.238	.	
	数量	36	39	39	39	39	

*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1 时具有相关意义。

问卷中，高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其安家意愿均无显著区别。中专文化程度者的数据不多，但表现出安家意愿的不同。只有一例在青玄村安家，本人年满 30 岁，中专毕业后又参军 4 年，然后回家务农兼务工；已婚，妻子在农村。其余三例的安家意愿一例在石门，一例在长沙，一例在广东她务工的城市。后三例的共同特点是中专一毕业就出去务工；务工年份晚，两个是 2001 年之后去的；务工年限短；年龄均在 24 岁以下，都未婚。可见，即使只涉及到安家意愿这一个变量，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在村庄的观念里是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并拥有了专业技术，所以在村庄的期望中他们就是城市正规职业的竞争者。这种期望传递给当事人，后者便会形成对自己生活目标的高预期。例如上述三例愿在外安家者中的一人就毕业于常德农业中专，但他并不想留在县城。至于那例选择在青玄村安家的，虽然是家电维修中专毕业，但毕业后连续 4 年在部队后勤部门服役，每天职责就是做饭，所以中专文凭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技术内涵，对于他在城市就职不能提供任何技术支持和信心支持。

本村外出人员中被公认最有成就的两位务工人员我都已经访谈到，张国峰今年 26 岁，初中肄业，1992 年出去务工，现在是一家瑞士投资内衣企业的主任级管理人员，每月工资 5000 元以上；袁国初小学文化，现年 35 岁，曾因偷窃罪服刑四年，1996 年出狱后外出务工至今。现在是外资耐克鞋厂副经理。他们自己及外地妻子的户口都在青玄村，自己全家住工厂给管理人员提供的公寓楼，既不买户口，也不买房。当我询问时，前者说每个月的应酬就要花掉一、二千，何况还有其他开支，但并没有否认今后会打算买房。后者则已经在村里买了房，并表示“还是不适应，在城里生活好累，老子以后不想干了还回去养老”。可以说，当事人对以自己能力保持并提高自己目前城市生活水平的预期是决定他们是否准备在城市安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个现象是，当事人的家庭背景对改变当事人观念及自我认定的方式起着重要的动力支撑作用。阎光红现年 38 岁，其父是县中医院老院长，文革中被批斗革职回乡。阎有富 43 岁，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后失去下落；父亲是地下党员，但文革中被批斗致死。他们全家被赶出后流落到青玄村。这种本应享有政治经济殊荣的家庭背景是他们二人在访谈中特意向我说明的。阎光红的兄弟有的顶职，有的在县城教书，只有他一人留在农村。他现在在城市务工的最大动力就是为自己在县城买房，恢复城里人身份。阎有富在村里长大，两次过继给别人，后又当了邻村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他当过兵，复员后当过矿长，1991 年煤矿垮了后一个人悄悄到了海南。干过电工，承包过工程，现在在一个小区搞物业管理，生活很轻闲，也很惬意。他女儿在三亚南山寺风景区做讲解员，儿子秉承父业，妻子在家开个麻将馆，住房由物业提供。他们全家都过着完全的城市生活，他们家两个“第二代流动人员”对自己海南人的身份很认同，但他们全家都还是青玄农村户口。阎有富也不准备买户口，他说他们老两口以后还是要回去的。

3. 择偶取向

在 35 位已婚者中，有袁红英、袁国初、张国峰和袁云贵四人找的是外地配偶，且都是在务工过程中结识的工友。四人年龄都超过 25 岁。从表中可见，不论未婚者还是已婚者，其择偶意愿都具有相似的取向，都将和自己条件相当及人品好作为最注重的要素。对于“只找老乡”一栏，已婚者的比例较高，这是因为这对于他们已经是既成事实，是在原来择偶圈狭窄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并不像未婚者那样是纯粹自主意志的体现。所以这只能表示通婚圈在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的差别，只是个体社会活动范围的反映。理解了这个因素，就可发现他们的择偶观并没有发生大变化。

表 13 婚姻状况与择偶意愿列联表

择偶意愿 (%)	只找老乡	找当地人	只看人品	有钱又好但岁数大很多的人	和我条件相当的人	条件要好的人	总计
未婚	1(25.0)	0(0.0)	3(75.0)	0(0.0)	3(75.0)	0(0.0)	4(100.0)
已婚	20(57.1)	0(0.0)	15(42.9)	2(5.7)	12(34.3)	3(8.6)	35(89.7)
合计	21(53.8)	0(0.0)	18(46.2)	2(5.1)	15(38.5)	3(7.7)	39(100.0)

但是，由于在外务工的未婚者有更大的通婚圈，业缘交往几率大于地缘交往，所以他们结识伴侣的途径会和已婚者不同，这并不是以 25 岁和 90 年代为标准。问卷中也反映，未婚者通过“工友介绍”、“自己寻找”和“一起打工所以认识”而结识恋人的比例显著高于通过“父母张罗”和“媒人介绍”的比例。且 21 世纪出去务工的更有这种倾向。

表 14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与生育意愿相关检验

		年龄	若无孩子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显著值(双尾)	.0113
		数量	44
	若无孩子	相关系数	0.312
		显著值(双尾)	0.113
		数量	27

4. 育儿观念

在生育观和教育观方面, 年龄是不是区分的标准呢? 问卷中第 27 题, “如果您还没有小孩, 您准备——”, 选择“不管生男生女都只要一个”的比例高达 77. 8%, 选择“第一胎是女孩, 就再要一个”的比例为 7. 4%, 选择“不管生男生女都想多要一个”的比例是 14. 8%, 没有人选择“不想要”。表 14 考察年龄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是否有影响。从表中看显著值 $Sig = 0. 113 > 0. 05$, 表明总体中这两个变量并不相关。即年龄对生育孩子数量没有影响。

表 15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与生育目的相关检验

			年龄	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	增添情趣	老人心愿	维系感情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相关系数	1. 000	-0. 089	-0. 286	0. 128	-0. 259	-0. 007
		显著值(双尾)	.	0. 589	0. 077	0. 436	0. 112	0. 965
		数量	44	39	39	39	39	39
	传宗接代	相关系数	-0. 089	1. 000	0. 350(*)	-0. 224	0. 207	0. 224
		显著值(双尾)	0. 589	.	0. 029	0. 171	0. 206	0. 171
		数量	39	39	39	39	39	39
	养儿防老	相关系数	-0. 286	0. 350(*)	1. 000	0. 000	0. 207	0. 447(* *)
		显著值(双尾)	0. 077	0. 029	.	1. 000	0. 206	0. 004
		数量	39	39	39	39	39	39
	增添情趣	相关系数	0. 128	-0. 224	0. 000	1. 000	0. 322(*)	0. 385(*)
		显著值(双尾)	0. 436	0. 171	1. 000	.	0. 045	0. 016
		数量	39	39	39	39	39	39
	老人心愿	相关系数	-0. 259	0. 207	0. 207	0. 322(*)	1. 000	0. 403(*)
		显著值(双尾)	0. 112	0. 206	0. 206	0. 045	.	0. 011
		数量	39	39	39	39	39	39
	维系感情	相关系数	-0. 007	0. 224	0. 447(* *)	0. 385(*)	0. 403(*)	1. 000
		显著值(双尾)	0. 965	0. 171	0. 004	0. 016	0. 011	.
		数量	39	39	39	39	39	39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 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 01 时具有相关意义。

问卷中题 28 分析他们生育孩子的目的, 比例分别如下: 传宗接代 41. 7%, 养儿防老 41. 7%, 增添情趣 72. 2%, 遵从老人心愿 30. 6%, 维系感情 36. 1%。考察年龄与他们生育目的的相关性, 表 15 显示二者均不相关。

5. 教育期望

问卷题 25 考察务工人员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表 16 显示绝大部分务工人员期望孩子将来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表 17 显示年龄、孩子个数与他们对子女受教育期望三者之间都有显著相关性。务工者年龄越小, 越对将来自己子女抱较高的教育期望; 孩子数越少或没有孩子, 越愿意让将来自己的子女接受高

表 16 90 年代青玄村外出务工人员对孩子受教育的期望

		频度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变量	读高中, 将来考大学	31	70. 5	77. 5	77. 5
	读中专	1	2. 3	2. 5	80. 0
	读职高, 早点独立	2	4. 5	5. 0	85. 0
	初中毕业算了, 早点去学手艺	3	6. 8	7. 5	92. 5
	其他	3	6. 8	7. 5	100. 0
	合计	40	90. 9	100. 0	
	缺失值	4	9. 1		
总计		44	100. 0		

等教育。一位两个孩子的家长为儿子和女儿分别选择了表16中考大学和读中专两个选项,显示农村对男孩和女孩的性别期望仍然不一样。从表17还可以看出,年龄越小的务工者,越倾向于少要孩子。

表 17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孩子个数与子女受教育期望相关分析

		年龄	孩子个数	孩子读书
年龄	皮尔森相关	1	0.419(*)	0.434(**)
	显著值(双尾)	.	0.019	0.005
	数量	44	31	40
孩子个数	皮尔森相关	0.419(*)	1	0.579(**)
	显著值(双尾)	0.019	.	0.001
	数量	31	31	30
孩子读书	皮尔森相关	0.434(**)	0.579(**)	1
	显著值(双尾)	0.005	0.001	.
	数量	40	30	40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1 时具有相关意义。

四、社会交往

1. 交友意愿

社会交往反映出主体生活内容的变化和主体对自我发展的设计。那么 90 年代青玄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交活动状况如何? 25 岁年龄上下的人有没有区别呢? 问卷中题 52 询问“当您结交朋友时,您喜欢结交——”,表 18 是对这个问题的统计。从表中看,务工人员大部分已经开始认同功利性交往,希望结交“对自己有利的人”和“混得开的人”的比例共高达 60.5% 人次,并且最不愿意结交老乡,这表明他们迫切需要资本化的社会关系,同时,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又决定了他们渴望社交的安全性和形成对自身的认同,所以仍愿意结交“老实人”和“与自己条件一样的人”。

表 18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交友意愿

分类标签	变量名	个案数(人)	反应比例(%)	个案比例(%)
	交老实人	27	42.2	71.1
	混得开的	10	15.6	26.3
	有利的人	13	20.3	34.2
	条件一样	9	14.1	23.7
	老 乡	5	7.8	13.2
	合 计	64	100.0	168.4

注: 7 例缺失 38 例有效

表 19 是对年龄与各交友意愿之间相关性的考察,从表中看出二者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2. 密切关系圈

那么他们在务工地实际的关系圈具有什么性质? 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人仍是首属群体成员还是成功地实现了异质性交往的产物呢? 这体现了他们交往的外在开放度,也反映其社会活动的分化程度。问卷中题 53:“在城市务工生活中,您日常来往关系最好的人是——”。看表 20 我们发现,年龄与其他各项的显著值均大于 0.05,这表明看不出年龄对于他们作出这一选择的影响。

但当考察与占据不同职务岗位的人来往关系最密切对象的身份的时候,卡方分析却能发现有意义的结果。职务岗位在问卷中分为“劳务”、“管理”和“文职”三类,分别用 1, 2 和 3 来表示。职务岗位与按照表 19 排列的密切关系对象的次序,卡方分析的似然比率(Likelihood Ratio)分别为 0.218、8.784、8.470、1.379、3.194 和 10.007,双侧近似概率(Asymp. sig[2-side])分别为 0.897、0.012、0.014、0.502、0.203 和 0.007。很显然第二、第三和第六组数字表明了二者的相关性。即:一个人占据的不同职务岗位,对于务工者和亲戚、同事及管理人员在务工地建立密切关系显著相关。此处“亲戚”虽仍是老乡,但已经被排除在纯粹“老乡”身份选项之外了。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务工路径严重依赖血缘和地缘关系这一点,对于其与亲戚的高关联性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和第六项表明随着职务岗位代表数字的递增,即越是管理人员和文职人员,其和同事及管理人员的关系越密切。这说明交友圈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工作

性质影响,反过来工作性质又改变着他们的交友意愿,而不是年龄在起作用。

表 19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与交友意愿相关检验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交老实人	混得开的	有利的人	条件一样	结交老乡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0.089	0.046	-0.144	-0.005	-0.082
	显著值(双尾)	.	0.579	0.777	0.368	0.975	0.610
	数量	44	41	41	41	41	41
交老实人	相关系数	-0.089	1.000	-0.070	-0.283	-0.115	0.268
	显著值(双尾)	0.579	.	0.663	0.073	0.473	0.090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混得开的	相关系数	0.046	-0.070	1.000	0.101	0.248	-0.038
	显著值(双尾)	0.777	0.663	.	0.529	0.118	0.813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有利的人	相关系数	-0.144	-0.283	0.101	1.000	0.145	-0.254
	显著值(双尾)	0.368	0.073	0.529	.	0.365	0.109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条件一样	相关系数	-0.005	-0.115	0.248	0.145	1.000	0.343(*)
	显著值(双尾)	0.975	0.473	0.118	0.365	.	0.028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结交老乡	相关系数	-0.082	0.268	-0.038	-0.254	0.343(*)	1.000
	显著值(双尾)	0.610	0.090	0.813	0.109	0.028	.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表 20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与密切关系身份相关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家人最好	亲戚最好	同事最好	朋友最好	老乡最好	管理人员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0.242	-0.032	0.209	0.248	-0.075	-0.004
	显著值(双尾)	.	0.128	0.840	0.190	0.118	0.643	0.980
	数量	44	41	41	41	41	41	41
家人最好	相关系数	-0.242	1.000	-0.108	-0.208	-0.223	-0.265	0.010
	显著值(双尾)	0.128	.	0.501	0.192	0.162	0.094	0.951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41
亲戚最好	相关系数	-0.032	-0.108	1.000	-0.082	-0.062	-0.027	-0.149
	显著值(双尾)	0.840	0.501	.	0.610	0.701	0.868	0.352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41
同事最好	相关系数	0.209	-0.208	-0.082	1.000	-0.075	-0.116	-0.181
	显著值(双尾)	0.190	0.192	0.610	.	0.641	0.471	0.258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41
朋友最好	相关系数	0.248	-0.223	-0.062	-0.075	1.000	-0.105	-0.033
	显著值(双尾)	0.118	0.162	0.701	0.641	.	0.513	0.839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41
老乡最好	相关系数	-0.075	-0.265	-0.027	-0.116	-0.105	1.000	0.059
	显著值(双尾)	0.643	0.094	0.868	0.471	0.513	.	0.716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41
管理人员	相关系数	-0.004	0.010	-0.149	-0.181	-0.033	0.059	1.000
	显著值(双尾)	0.980	0.951	0.352	0.258	0.839	0.716	.
	数量	41	41	41	41	41	41	41

3. 社会活动

问卷中题 57 是“您在务工城市参加过什么活动吗？”表 21 显示, 90 年代青玄村外出务工人员中, 58.1% 的人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 其单位也从来没有组织过, 其余 41.9% 或参加过单位组织的、居委会组织的活动, 或自己寻找娱乐方式。考察 25 岁以下流动人员也是如此, 有 7 人没有参加任何活动, 2 人由单位组织过, 1 人有时候跳跳舞。总体说来, 集体内部的互动和交流还是很缺乏的, 这既阻碍他们扩大次级联系的交往, 也不利于对城市社会产生认同。当 58 题询问“您在城里工作之余, 是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活动还是和好朋友单独活动”时, 只有 27% 的人愿意参加集体活动, 73% 的人都愿意和好朋友单独活动。从表 21 看出, 性别、年龄和务工人员参加活动状况及活动形式都不相关。惟一相关的是参加活动状况与活动形式(1 集体, 2 单独)之间的相关性。表明务工人员即使有活动也多是个人活动。

表 21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性别、年龄、参加活动及其形式相关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		性别	年龄	参加活动	集体单独
性别	相关系数	1.000	-0.177	0.136	0.040
	显著值(双尾)	.	0.249	0.386	0.815
	数量	44	44	43	37
年龄	相关系数	-0.177	1.000	-0.022	-0.054
	显著值(双尾)	0.249	.	0.887	0.750
	数量	44	44	43	37
参加活动	相关系数	0.136	-0.022	1.000	-0.376(*)
	显著值(双尾)	0.386	0.887	.	0.022
	数量	43	43	43	37
集体单独	相关系数	0.040	-0.054	-0.376(*)	1.000
	显著值(双尾)	0.815	0.750	0.022	.
	数量	37	37	37	37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统计结果表明, 务工人员的休闲活动既单调, 又具有自组织性。他们的活动内容按选择频次的多少依次为: 看电视(65.9%), 看书报(58.5%), 逛街(39.0%), 搞个人卫生(34.1%), 其他还有打麻将的、找老乡或亲戚玩的、看录像或其他“娱乐”的, 根本没有休闲活动的还占据 19.5%。考察年龄与休闲活动的相关性时, 发现年龄只与表 22 所列三类情形有相关性, 说明年轻人更愿意逛街和看书报, 年龄大的人更可能没有休闲时间。但并不能找到 25 岁的界限。

表 22 青玄村 90 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年龄与其他三类休闲状况相关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		年龄	逛街休闲	看书报	没有休闲
年龄	相关系数	1.000	0.492(**)	0.375(*)	-0.435(**)
	显著值(双尾)	.	0.001	0.016	0.004
	数量	44	42	41	41
逛街休闲	相关系数	0.492(**)	1.000	0.267	-0.394(*)
	显著值(双尾)	0.001	.	0.091	0.011
	数量	42	42	41	41
看书报	相关系数	0.375(*)	0.267	1.000	-0.335(*)
	显著值(双尾)	0.016	0.091	0	0.032
	数量	41	41	41	41
没有休闲	相关系数	-0.435(**)	-0.394(*)	-0.335(*)	1.000
	显著值(双尾)	0.004	0.011	0.032	.
	数量	41	41	41	41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1 时具有相关意义。

* 显著性水平(双尾)为 0.05 时具有相关意义。

4. 被组织意愿

题59考察“假如当地有一些社会组织,您最愿意参加的是哪些?”统计结果显示青玄村9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最愿意参加的组织依次是体育组织(65.9%),老乡协会(36.6%),维权组织(34.1%),劳动服务中介(26.8%),工会(22.0%),党团组织(17.1%)。都不参加的也有17.1%。考察年龄与以上各项的相关性,只与“工会”相关,相关系数0.390,显著度0.013,与其他几项均不相关。

以上对青玄村90年代外出务工人员的问卷分析,没有任何一项指标支持“新生代”这个概念。我认为,王春光们的问题在于,在界定“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个“假设性概念”时,首先已经设定了90年代农村外出流动人口为一个特定群体——新生代,80年代为第一代,然后将该群体与第一代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果,而不是抛开90年代外出这个纬度,单独以其他纬度来得出与90年代外出群体相同的群体特征的结果,所以实际上他只采用了一个纬度。

以上分析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概念的内涵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外出务工人员的各项指标受到很多因素干扰:外出务工者原来生活的社区环境特征是封闭还是相对开放,他们的人生际遇、家庭背景、教育理念和目标,他们的主体特征如年龄、个性、意趣等,还有国家和城市的管理政策……远不是90年代外出并且现年25岁以下就能满足要求的。所以,我建议取消这个用法,或者寻求其他更确切的概念内涵。

参考文献:

- 蔡昉主编,2001,《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谌新民,1999,《中国劳动力流迁的动因和成本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池福安,1998,《高校“独生子女新生代”的思想行为特点分析》,《思想教育研究》第3期。
- 金汕、孟固,1997,《世纪之交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神州学人》第7期。
- 柯兰君、李汉林主编,2001,《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惠斌,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期。
- 李强,200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李强,唐壮,2002,《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开明,2003,《边缘人》,新华出版社。
- 吕杰,1995,《跨世纪新生代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及培养机制》,《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
- 罗霞,王春光,2003,《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
- 沈杰,2001,《“新人类”:一种社会学的解读》,《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王春光,2000,《新生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求》,《民主与科学》第1期。
-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铭铭,1997,《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
- 俞德鹏,2002,《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
- 赵树凯执笔,课题组,1997,《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折晓叶、陈婴婴著,2000,《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
- 郑功成,2002,《经济全球化下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第5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罗琳